

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项目

中国南方跨界族群 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学术论文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课题资助项目

中国南方跨界族群 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学术论文集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学术论文集 / 杨民康
著.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81096 - 734 - 1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音乐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J609.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7012 号

ZHONGGUÓ NÁNFANG KUÀJIÉZÚQÚN YINYUÈWÉNHUÀ YANJIÚ

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 杨民康学术论文集 杨民康著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 23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96 - 734 - 1

定 价: 7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序

曹本冶

民康邀我为他的学术论文集《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写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自民康攻读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起至今，他对学术的专一和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寻，一直给我深刻的印象，本论文集汇集的论文可谓他研究成果之冰山一角。

曾与民康探讨过抽象理论、实用理论和方法学与实践运用之间的关系问题。音乐学是个研究“什么是人的音乐”的学科。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的一个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对所谓的理论和方法学情有独钟，大堆大堆取自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学堆砌在我们的研究之中。但是，如果这些理论和方法学不能具体连贯到“人是怎么制造音乐的”和“人是怎么接收音乐的”这两个基本和关键性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对理论的陶醉，其意义何在？理论也好，方法学也好，都应该显示出它们与实践的关系，学界已经有很多“理论化”理论的文献梳理，我们更需要的是音乐研究的体悟和从这些经验中浮现出来的理论，以理论之实践应用性，去让我们“说理论”的权威达致合理性和合法化。民康这本论文集内的一些论文显示了他多年来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努力。

这本论文集的整体指向是音乐文化的“跨界”研究。这个“跨”，顾名思义指的是两个或多个音乐文化单元之间的“跨”，采用比较手段是其研究的必然性需要。比较作为一种工具，在跨界研究中有两个目的和操作的层次：1) 探索两个或多个音乐文化单元之间的一些与音乐相关的“异”和“同”的表层因素，以建构一张异同组成因素的清单；2) 对这些异同组成做“跨界化”互动关系的分析和阐释，以达致一些较宏观文化涵义层面的认知。国际民族音乐学界颇有影响力的非洲学者 K. 恩克蒂亚 (K. Nketia)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Contextual Strategies of Inquiry and Systematization” (北美民族音乐学学会 [SEM] 年会之“西格纪念演讲系列 [Seeger Memorial Lecture]”主题发言的发表稿，1990 年)，里面对“语境 (context)”和“语境化 (contextualization)”两个同类却不同含义的概念做了精辟的解释

——音乐的“语境”是音乐事件场合中的各种组合因素（我这里的补充是，它如同一张清单，是语境组成因素的平面铺展）；而“语境化”则是对这些组合因素互动关系的探究（我的理解即是，对与音乐相关组成因素互动关系的立体性分析和评估，或称之阐释）。上面提及“跨界”研究的两个目的和操作层次当可以用恩克蒂亚的“语境－语境化”概念来认识——即“跨界”研究可视为是两个或多个音乐文化单位的与音乐相关的“异同”因素之比较，而对这些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则是“跨界化”的研究。

很是欣赏民康这本论文集的开场篇《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四十年从艺、求学的心路与族群文化记忆》，这是一个“人化”了的自白，让我深深感受到民康这些年来对学问的追求和执着学术研究理念的根源。正如民康所说，论文集收纳了他学术生涯中不同时期的研究心得，活态地显示了他的学术成熟过程。民康对我说他将接近退休年龄。我想，这应该是他学术思维成熟结果的黄金时期，以往多年在知识层面的累积和扩建，此刻将汇集、沉淀为认知。得知民康尚有另外两本专著论文集正在计划出版，我期待着……

2013年5月19日

写于上海

目 录

序	(1)
---------	-------

一、跨界族群音乐比较与方法论研究

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四十年从艺、求学的心路与族群文化记忆	(1)
----------------------------	-------

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

——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	(15)
-----------------------------	--------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	(22)
------------------------	--------

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 - 隐”历时研究观

——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	(32)
------------------------------	--------

论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音乐的社会阶层特征	(53)
-------------------------------	--------

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	(65)
----------------------------------	--------

论佛教传播史晚期的音乐本土化

——傣族和日本佛教音乐的比较	(82)
----------------------	--------

保持、求变、追踪

——中国与周边南传、汉传佛教音乐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96)
--------------------------------	--------

二、传统仪式音乐研究

仪式音乐、旋律学与音乐符号学

——兼从云南少数民族仪式音乐的纵 - 横二维符号结构系统看仪式	
---------------------------------	--

音乐旋律的艺术与文化构成	(115)
--------------------	---------

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	(130)
---------------------------	---------

云南沧源县上班老寨佤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调查报告	(144)
---------------------------------	---------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概论	(155)
-----------------------	---------

响自苍峦深处的“圣歌”

——云南省瑞丽县登戛寨景颇族基督教仪礼音乐调查报告	(165)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	(170)
桂、黔、滇少数民族梅山教传统仪式与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	(185)
海南黎族传统仪式音乐考察与研究	(198)
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	
——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	(224)
海南黎族道公祭祀吹打乐的跨时空关系比较研究	(241)

三、传统民间音乐研究

从云南民歌发展现状看其传播方式与空间范围	(257)
论少数民族叙事歌的文化方式和功能更新	(270)
七十二调与十月太阳历	(274)
云南傣语叙事性民歌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音乐风格变迁	
——以西双版纳傣族赞哈音乐为实例	(279)
论布朗族人生仪礼与个体音乐活动过程	(301)
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的变异过程及其异文化解读	(314)
德昂族婚俗歌演唱活动实录	(328)
德昂族情歌“阿坡翁”当代发展变异状况的考察与研究	(333)
云南南亚语系诸族传统器乐民俗当代发展状况的考察与研究	(347)
后 记	(360)

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四十年从艺、求学的心路与族群文化记忆

作为一名普通的民族音乐学学者，非常感谢近年来《民族艺术》《音乐艺术》和《音乐探索》诸刊给我几次同学界同仁对话的机会，在几篇过去的访谈文章里，大致述及了我的学术经历和有关研究思维的想法片段。^①同时，我也非常珍视这次《民族艺术》“学界名家”专栏的约稿，它让我在这次新的对话中，纳入了不同于以往的、同“跨界音乐文化”有关的切入视角。

为了凸现既定的文化目的，下文将围绕“我与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展开，这缘于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客体性质；而从选题承担者及研究者的角度看，在该选题的整体研究思维和相关方法论的认识上，有一个不断积累、充分酝酿和逐渐成形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与我自己，亦即研究主体的人生经历、生活氛围及族群文化背景祸福相联，休戚相关。

本文所谓的“跨界音乐文化”，其“跨界”这一关键词含有如下两重意义：其一，近十余年里，我与一些学术同好一起致力于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它既是我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学术研究以来的阶段性总结、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由此迈向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其二，我的主攻方向一直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以往为了不要在“去音乐化”问题上为人诟病，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必须花在谈乐论艺上面。然而，有鉴于我踏入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学科以来，我从中得的一条重要的学术经

① 参见以下诸文：1.《学术访谈：既显笙歌弦韵 更见文化精神——兼谈仪式音乐研究的历史、社会、个体三维视域》（廖明君、杨民康），载《民族艺术》2004年第4期，第14—22，27页；2.《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廖明君、杨民康：学术访谈），载《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第18—26页（两文均载入张海洋主编：《多维视野中的艺术对话——中青年学者访谈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3.《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三）——杨民康研究员访谈录》，载《音乐艺术》2008年第2期，第122—125页；4.《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25年回眸——杨民康研究员学术访谈》，载《音乐探索》2012年第1期，第49—54页。

验之一，就是在从事一项研究之前，必须首先厘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学术立场，才有进一步去开展学术（包括音乐学术）讨论的资格；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也必须从关注“文化中的音乐”始，然后致力于“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梅里安姆语）。正好这次写作和发表的园地《民族艺术》并非纯音乐刊物，而是一个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接缘，带有引领“跨界”文化研究导向意味的艺术人类学名刊，因此我便有了一个可以走出音乐，超越艺术，结合本人（我）的成长经历、文化语境及族群文化记忆来进行另一种“跨界文化言说”的机会。就此而言，这另一种“跨界”并非可有可无的手段方法，而是为了达致最后目标的必经之途。

若进一步从学理上来加以认识，似有必要提及阐释人类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里，针对该学科研究方法提出了“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适应与经验”（Geertz 1973：363—364）三维关系的学术范式^①，同时还将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归纳为“归属性”（model of，以抽象的理论或图表体现的概念模型）和“对象性”（model for，上述模型的实践层面或真实状态）^②两类模型。在此，倘若将之理解为上述三维关系中都包含了“归属型—对象型”一对要素的话，那么，我们似有必要从“归属型”层面上，通过研究者的“个体适应与经验”，亦即本人在特定的族群氛围及文化语境中的成长经历和学术体验，来进一步讨论它同相关的学术研究思维和产品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应用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对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从此意义上讲，本文所言的“族群文化记忆”，其中“族群”或许兼涉血缘、地缘族群与学术研究族群。同样，“文化记忆”也将包括乡土文化记忆和学术传统记忆，分别来自本人所属的人们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

一、乡土音乐研究：延迟进发的族群文化记忆

若从民族音乐学（亦即音乐人类学）角度来谈“个体适应与经验”，有一个看似现成的套路，即通过剖析自己的“局内—局外”立场和身份，以“验明正身”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在我的户口簿上，写的是白族，籍贯云南大理，但我从小在昆明长大，对老家大理喜洲镇，是在大约30多岁，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后才有缘造访。那么，对于白族文化，我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我的白族身份与我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有什

^①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63—364.

^② 同上书，pp. 44—118.

么关系？不仅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有了这个心结，也不断有人就此提醒，乃至质询于我。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家乡大理喜洲，我却发现，缘于早期家庭生活氛围的影响和历史记忆，我对这个族群及其文化，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陌生。

我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幼时的印象里，在市中心崇仁街静定巷的一幢四合院内，有我的父母、外婆和几个幼小的子女，连同两位伯父（当时已去世）、一位叔父的亲属，共四户数十口人居住。巷子的外沿和紧邻的三榆里巷，有另外姓杨、董的两家，均与我们严（杨）家^①有姻亲关系。再走到崇仁街面上，不远处的一个巷子里还住着生活习惯和语言同我们相似的、姓尹的一户人家。直至上世纪末，他们共同保持着某些不为外人理解的（白族）传统生活习俗，老人在一起，都讲着一种我虽熟悉，但多半听不懂的土话（后来才知道是白语）。由于一些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原因，大家一直都对自己的白族身份及来源讳莫如深。除此之外，这两条巷子的人，无论穿着谈吐、行为举止乃至职场关系，均与普通的昆明汉族市民无异。过了二三十年，直到我成年后，才从长者言谈及相关族群史料里知道，此处带有“三坊一照壁”白族建筑风格的房屋，原为一进五院，分别为严姓父辈5兄弟所有。如果不是文革前后“添沙子”，由政府迁入许多外来住户，上述白族人在此聚居和生活之地，近百年来就是一个位于省会昆明的、典型的白族村。半个世纪以前，这里的严、董、杨、尹四姓，活脱就是大理喜洲镇白族中该四姓家族（即当地人所谓“四大家族”）的“昆明版”，亦是当时大理喜洲白族商帮中严氏“永昌祥”昆明总号的所在地。它作为云南茶马古道文化的心脏和经济活动中枢之一，起到掌控其经济文化走向的作用，并由此对于云南本地乃至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经济文化给予了特殊的贡献。对我个人的意义则在于：它已在冥冥之中成为我能够此后在其基础上从事跨界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舞台和研究起点。

1966年“文革”开始，我11岁，上小学四年级。此前，父亲因“涉右”被贬为单位的图书管理员，借此近水楼台，无意中养成了我自小“博览闲书”的嗜好。到了1966—1970年上初二这四五年间，在学校无书可念，只能回家随缘而读，这时的阅读，便进入了某种雅俗不分、荤素不辨、精芜杂存的境地，这对我此后的读书、问事乃至治学方向不无裨益，也为将来从事有相似内涵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打开了一扇门窗。然此时读书虽然杂泛，其中能让我至今留有较深印象的，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是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定期寄来的红卫兵小报，它虽然充满喧嚣、暴力和血腥，但为我展示了一片簇新的外来世界。另外还有三哥（时为云大数学系学生）此

① 本人祖上姓严，父辈有5兄弟，父亲一支因为归宗而改为杨姓。

前一直订阅的《新文学史料》和“扫四旧”后，父亲少量藏书里剩下两套丛书（各含数十册）：《文史资料选辑》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其中便包括让我至今记忆甚深的，父亲在“涉右”前后撰写的一些主要文论。在那学业荒芜，教科书匮乏的年代，就这几种书，我终日捧在手中，啃读日久，几致残破，从中饥不择食地汲取了一些人文社科知识的养料，受到了涉及云南地方史中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跨界族群文化的最初的启蒙教育。比如，通过阅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1965）载入的一批商业民族史志个案《永昌祥简史》^①《滇人赴缅工作及经商情况简述》《泰缅经商回忆》《云南马帮运输概况》^②及其他篇章，让我了解了大量有关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云南鹤庆帮、腾冲帮、喜洲帮等各大商帮在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经商；许多普通的云南人由于生计或命运所迫，在两地来回流动、迁移，打工谋生乃至异乡从军、为“匪”的史迹。对我来说，经历了那样一段“非典型”的自学经历，除了给我自己遗下了要与之终身缠斗的、当时书中读到的那许多的“白眼（错别）字”、“疑团”外，也在我不成熟的脑海里种下有关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异国文化（也即后来所说的跨界族群文化）的许多梦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预设了一个个有待破解的、同自身文化身世背景乃至云南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文化史相关的文化“密码”。但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后来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些看似幼稚而浅显的梦想和目标，或许倾注我的毕生精力和时间，都将难以完全企及。

昔闻邻家有一位男孩，两岁以前哑然无语，父母甚忧，惟恐日后落下残疾，不想一日突然开口说话，不仅思维逻辑清晰，表达完整丰富，而且话语中包含了来自爷爷奶奶的许多方言口音。闻后，我在惊奇之余，将它比之为延迟迸发的家族记忆。在此方面，我个人也有颇为相似的晚熟、迟醒的经历。幼年时期，讷于言，拙于行，沉湎于杂阅、幻想的个人世界，甚至父母家人也颇为不解，视之为呆痴之状。后来进入到族群杂糅互渗，文化变迁频仍的尘世社会，作为文化个体，历尽了幼时的昏聩懵懂之后，迈向“而立”、“不惑”乃至“天命”之年，返身对往事进行回溯和思考，我的脑海里便不断地迸发出一些延迟而来的族群文化记忆，甚至才猛然悟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均有助于我去认识自身当下所处的社会语境和角度方位，厘清自己文化思维的来龙去脉，最终去激发、破解上述那些文化密码。我在北京高校学习、工作近三十年，却一直坚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并且最终

① 为先父杨克成遗著。

② 以上均见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昆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年。

进入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语境范畴。在这条不归的学术路途上,看似发生了一连串的偶然现象,其实它是一个必然的文化宿命,且有血缘、地缘的文化基因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1992)出版二十年了,回首一看,该书选题之宏大,联想之广泛,内容之庞杂,其缘起既与本人当时作为学术幼犊,胆大无畏有关,同时也有受我生来即处的血缘群体与地缘文化环境影响的原因。

原因之一,或许同我从小学时开始填写,然后花了近五十年时间才想明白了的“白族”身份有关。原因之二,或许部分来源于我的族群文化记忆里存在的地缘文化印象。由此再看“我与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我(作为研究者)栖身于首都北京,研究对象却远在云南边陲;人是“白族”学子,研究对象则包罗万象,涉及贝叶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茶马古道文化、藏彝走廊文化……正是循着上述“血缘”、“地缘”两重文化因缘走下去,使我逐渐悟到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圈、文化层和文化丛的内涵和外延。

自此,科学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体验民族志)的学术争议便不断在我的身上得到应验。一直以来,科学民族志给我的教导是要客观、冷静,要用异文化心态对待一切研究对象,在书写方式上也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这个老旧的原则对于我这个“局内的局外人”来说,好像已越来越不适用。当我在异文化的土地上走了一遭^①,又在业缘文化的场域里,重新面对自己久违了(但心向往之)的血缘族群和地缘文化时,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先人和父辈贴得那么近,我们无论是在血缘还是文化上都有那么深厚的渊源关系。为此,我开始有了上述一种抑制不住地想把它写出来的冲动。

二、“潜水”之后:走向跨界族群音乐研究

我们这一代学人,都出生在一个政治、文化疆域相对隔绝,社会和群体流动相对静止的年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当时遗下的有关社会及族群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去体察自己身前身后的两端。在真正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之前,由于一直学习和演奏西洋乐器小提琴,而后涉猎采用西方艺术思维的作曲理论,在从事了大量的音乐艺术实践活动(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创作、表演和采风内容)和由此养成正常

^①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主要从事的是掸傣族群和孟高棉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对于白族音乐甚少关注。

的逻辑思维和文化思维能力的同时,我的语言、文字的表达、交流方式常常仅限于非书面语^①,而在书面文字写作和表达能力乃至“写文化”思维、少数民族文化基质、意识等方面,长期处于“潜水”状态,一直未得到适时开发的机会。所以,当我1986年(时年31岁)为考研究生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学写文章),^②1992年出版第一本书《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并初获学界好评时,就连我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此外,自30年前我开始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所写的大部分音乐作品和绝大多数学术论著,都属于较微观、具体的南方少数民族音乐题材或研究范畴。但我在处女作《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一书里,却选择了一个对象偏于宏大、内涵颇显复杂的学术命题。该书1992年出版后,有海外学者认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歌的音乐专著^③,也有国内的同行学者颇感诧异,一个有较纯粹艺术表演和创作经历的音乐学学者,为何去写,又为何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偏离艺术主题的音乐文化学著作?其实,回头一看,在我貌似单纯的学术经历和艺术道路后面,却掩藏着颇复杂的族群文化来源和地缘社会背景。

1. 以双脚丈量土地:行为方式的隔代再现及螺旋性发展

作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学者,万事皆从“行万里路”开始。从我初阅人事至今,用了40年以上的时间,用双脚丈量土地,用手、眼、脑认知世界,逐渐对于身边所处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语境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也慢慢有了行动的能力和做事的主见。

1970年,我开始步入昆明市红色娘子军样榜戏剧组^④乐队从艺,前十余年随剧组下乡演出、劳军慰问,后三十年到处采风和考察民间音乐,迄今除了足迹已遍布国内各省区和部分相邻国土外,还到过西南各边境地带。无数次日临入境关卡,夜宿边防驿站,每每离缅甸、老挝、越南等邻国仅一步之遥,却要么一线国境横陈,

① 这里的“语言”不限于自然语言,可包括音乐语言在内;反之,“书面”仅限于文字书面,而不包括作曲这另一“书面”层次。

② 据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田联韬教授告知,对1986年我所提交的论文,时任音乐学系主任的蓝玉崧先生对他说:“这次考生交来的论文中,云南考生杨民康的论文最好,条理清晰,有内容。”

③ Yang Mu. 1998 “Current State and Methodology of Chinese Music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Tongyang Umak* (东洋音乐, Foournal of the Asian Music Research Institut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9—29.

④ 即昆明市民族歌舞团和昆明乐团的前身,花灯团歌舞队。

要么一条界河阻隔，始终无缘企及。记忆犹新的是，那时要想到达边境线，还要越过一道道检查站，事先要在昆明或北京办理边境通行证。所办手续比今天从北京去一趟越南、缅甸还要麻烦。这时，我便想起了十几岁时，在那套“乡土教材”——《云南文史资料选辑》里读到的，早我两三辈的一代云南人，早已经有了跑马帮，下缅甸，入越南，再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经商，“走夷方”淘生活的习惯。在这些赶马人和淘生者中，便包含了先祖父一群人的身影。祖父少年经商，从做学徒和赶马人起步，后来组织了马帮，往来于大理与各州县乃至东南亚邻国之间，靠贩卖丝茶经商致富。对此，史家的说法是：“云南丝茶叶之振兴，自（严）镇圭始。”^① 不仅如此，那时的云南省，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活动，可说都离不开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有鉴于这些历史知识，许多（尤其是家族史）都是在先父的遗著里读到的，所以留给我异常深刻的印象，也为我此后不期而同地走上这条茶马文化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到了父亲这一辈，所涉及的云南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更加广泛，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有了更加明显而直接的影响。1992年，我到云南沧源县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上班老佤族村寨考察，“一代佤王”保洪忠老先生和佤族歌手王江底为我唱诵了流传在该地数十年的一首佤语《抗英歌》，这首歌便起源于云南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沧源边界“班洪抗英事件”（1934年）。当时，沧源县的班老、班洪等佤族部落，曾联合附近的其他民族人民，为了抗击外来侵略者对我国矿产资源和领土的掠夺而浴血奋战。先父于1935年从美国留学归国，专程绕道英伦，用三个月时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资料，在国内发表了《英人经营滇缅边界之史实》^②一文，在当时的舆论界发挥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后代永志不忘，有关政府部门分别在上班老和沧源县城建立了两块“班洪抗英纪念碑”，分别置于班老边境与沧源县城。纪念碑的碑文便由先父题写。此后，只要我前往该地考察，父亲都非常关心，要听我事后的详细汇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在跨界族群文化的研究上，我和父亲两代人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代际交接和薪火相传。

后来，因为课题经费和学术方针政策的限制，出境研究的梦想又被耽搁了许多年。这种为政治边界、文化政策和资金条件所阻隔，长期无缘出境活动、考察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前后。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公私不同渠道，先后出访了泰

① 《续云南通史长编》（下册）第802页。

② 杨体仁（杨克成）：《英人经营滇缅边界之史实》，上海：《民族杂志》，第3卷第5期，第813—833页。抗战时期由李根源推荐收入《永昌府文征》。

国、缅甸、老挝、越南诸邻国，分别采访了南传佛教安居节及各种民间仪式音乐；在泰北美什落地区造访了上世纪中叶逃往境外的蒋军移民部落；在前往清盛的路上又巧遇了那时迁往泰国定居的马帮后裔——姓马的回族女商户。我们开始不断获取有关东南亚与中国南方诸民族音乐文化之间联系的第一手资料，也有了第一批主要同东南亚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此时回想起半个到一个世纪以前，我的先辈便曾以同样的方式途径，取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对于我们共同面对的这个世界有了先一步的体认和实践。如果把这种表现为历史周期性重复和族群记忆的现象联系起来，似乎就印证了意大利美学家马里奥的下述观点：“历史是没有奇迹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差别不在于连续中奇迹的爆发；相反，它是一种不同于自身的连续，在它的过程中，不同的行为经过了相同的仪式设计……罗马历史似乎更像是以螺旋状前进。对于那些从螺旋顶部或者底部竖直观察的人来说，仪式形式总是相同；可是，对于那些从侧面观察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地，那些环状总是不同的。”^①

2. 以手、眼、脑认知世界：思维方式的族群延续及书写实践

马氏在书中还提到：“对罗马来说，最重要的是仪式结构的永久存在，这种结构不需要什么确定和明白无误的神话参照点，却能借助这种不确定性而永远顺应特定场合的需要去获得新的内容。”^② 确实，在当初祖辈先人从云南到东南亚邻国的一次次往返和我自己后来的同类行为之间，尽管已经相隔好几十年，且有着不同的活动性质和内容，但在致力于本土和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上，彼此有着共同的目的和意义。这对于云南来说，也体现了一种“仪式结构的永久存在”。如果我们将上述“仪式思维”带入跨界族群文化研究，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从不同时期的跨界族群研究工作里找到外在的（仪式的）相似点及历史继承关系，还能够从它不断更新的内容里，找到音乐文化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文化链接。

由此，我所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虽然着眼于当下，但它具有为仪式思维所强调的、当代文化的过渡性和临时性特点^③，

① [意] 马里奥·佩东尼奥拉著，吕捷译：《仪式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4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

③ 马氏“仪式思维”有三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过渡、模拟和没有神话的仪式。其中，“过渡似乎常让我们处于一种临时状态和一种不确定状态，这种状态就让存在中的静态和动态不可理喻地重合在一起。”同上书，第33—36页。

它的首尾同过去与未来相接,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应该把它放入前后贯通的历史中去看待和处理。此时,笔者提出了在该类研究中存在着“当代共时研究文本”、“多元历时研究文本”、“共时态可读文本”和“共时态可写文本”等一系列“元文本-对象文本”,并由此组成“多重元文本关系簇”的观点^①。其中,“多元历时研究文本”对于“当代共时研究文本”的重要补充和参照作用,即同本文的主旨密切相关。下面拟结合两个具体问题来谈。

三、跨界音乐文化研究观念的形成及两点特征

1. 跨界族群音乐中存在的“多元分层一体化格局”

由此来看我自己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是沿着由《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趟出来的路子,继续思考少数民族音乐(包括跨界族群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乃至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当代跨界族群音乐,尤其是壮侗语族和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群南传佛教音乐的整体性研究和跨界比较研究。

关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我认为它的狭义内容是指“聚焦于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外延分别涉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②。这是缘于“在西方研究中,族群成员的越洋(国)流动是常态;而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定居则是常态”^③。然从广义来说,该类研究其实存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原生文化层——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即指分布在同一条边境两侧,呈定居状态的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其二,次生文化层——跨国音乐文化研究。这一类研究更着眼于涵盖于族群因素之上的次生文化因素——国家政治、人为宗教和农业、工商业经济以及相关文化的横向传播交流等层面。其三,原生-次生文化层——移民音乐文化研究。指一类不局限于定居状态和紧密衔接状态,在边界两侧近距离或远距离地不定期流动的

①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载《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第86—94页。

② 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第9—13,18页。

③ 同上文。

族群音乐文化。^① 上述观点，可以说同本人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1992）、《中国民间歌舞音乐》（1996）等书里，响应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主张提出的，在中国民歌与歌舞音乐（乃至传统音乐）中存在着“多元分层一体化格局”的设想乃一脉相承。经此，我发现迄今人们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课题上，对其横向延展的文化区、文化带及其彼此的联系和交流问题考虑较多，而对于从“文化圈”着手，延及纵向叠立的“文化层”的关注比较少。以上认识，既缘于我多年来通过田野考察的观察和思考，也受惠于百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启发和诱导。

先从横向的方面说起。通过历年的史料可知，至少在半个世纪以前，与云南相关的诸跨界民族文化类型中，茶马古道文化以它丰富的层次内涵，居于跨界族群文化网络之中心的位置，皆因为在这条古道上，茶叶贸易连着贝叶文化一端，良马市场连着藏彝走廊文化这另一端，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又催兴了中缅边界两侧的丝绸之路文化。

再说说纵向叠立的方面。学者们以往虽然提出了茶马古道、藏彝走廊、西南丝绸之路等同跨界文化通道有关的命题，然而，难道其中仅只包含一个民族文化带、民族交流关系、文化邻接关系？它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如何与政治文化与主流文化层相接，商业文化又在其中起到怎样的连接点和润滑剂作用？这些，百年学术史及学者群落已经给了我们相对确切的答案。

2. 政治边界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变迁的影响

如今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云南、广西诸省区，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同一族群，被一条晚近形成和确定的“政治边界”所分隔，而在原生文化层面上，生发出有形或无形的变异性、区别性因素以及互文性因素。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去探究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那些当代世界格局中已经相对固定的“政治边界”对于国境两侧族群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关系到边界两侧族群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互融？最终，上述音乐文化互动对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变异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推动作用？^②

^① 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第9—13，18页。

^② 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代栏目主持人语》，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3—8页。